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ISSN 0583-0214



2026. **I**

史学月刊

SHIXUE YUEKAN

2026 年第 1 期

主 编 苗书梅

副主编 赵广军 李 恒

《史学月刊》编辑部

【专题研究】

西周诸侯与邦伯关系略论	徐 熠	5
论南宋和平时期的户部开支及其筹措	张亦冰	17
秘绘新图：同治年间清廷重绘全国舆图的尝试	易 锐	34
近代山东曲阜孔庙祀田清厘与“府”政关系	姚志良 吴佩林	48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军民誓约运动与政治动员	李健魁	61

【俄罗斯及苏联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煤炭销售辛迪加与南俄煤炭市场调节	张广翔	76
----------------------------	-----	----

主管单位 河 南 大 学
主办单位 河 南 大 学
河南省历史学会
编辑出版 《史学月刊》编辑部
(郑州市河南大学 0371-22869623)
主 编 苗书梅
编 辑 安 瑞 李 恒 张秀丽
苗书梅 周祥森 赵广军
徐 莹 高 阳
封面设计 王四朋
刊 号 CN 41-1016/K ISSN 0583-0214

顾 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王 巍 王子今
王学典 王建朗 朱凤瀚
朱汉国 吴景平 汪朝光
张国刚 陈 桦 陈支平
陈春声 陈谦平 林 沅
赵世瑜 侯建新 钱乘旦
阎步克 阎照祥 虞和平
瞿林东
编 务 徐 莹
英 译 马丹静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
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医疗社会史】

卫生现代性与身体的殖民：清末杭州“福音医学”麻风救济研究	周东华 朱相龙	88
------------------------------	---------	----

【思想史研究】

边界意识与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问题	臧 明 顿一鸣	99
两种无为——道家政治思想史中的张力与融合	许嘉林	110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三重理论视域下陈独秀的封建观	翟 宇	121
----------------	-----	-----

【读史札记】

曹魏崇文观考	杨宜霖	133
--------	-----	-----

CN41-1016K * 1951 * m * A4 * 136 * zh * P * ￥20.00 * 2500 * 11 * 2026-01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日根	王利华	王奇生
	邢广程	刘后滨	孙卫国	孙君健
	李剑鸣	吴义雄	张 生	张 越
	张 皓	张礼刚	张宝明	张倩红
	陈 新	陈星灿	苗书梅	侯旭东
	耿元骊	翁有为	展 龙	黄兴涛
	黄春高	章 清	彭 刚	彭南生
	韩东育	魏 斌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 价	20.00 元			

本 刊 告 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刊所发文章均由作者授予专有使用权。来稿一经本刊录用，即表明作者将文章的出版权、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和汇编权等授予本刊。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在作品发表时将一次性支付。如有异议，请在来稿中申明。

• 医疗社会史 •

卫生现代性与身体的殖民： 清末杭州“福音医学”麻风救济研究^{*}

周 东 华 朱 相 龙

〔摘 要〕杭州是麻风病中低流行区，自宋代以来一直未有麻风院隔离收容麻风患者。清末梅腾更医生主持杭州广济医院后，在万国麻风救济会和杭州地方官绅资助下，创建专门收容麻风患者之广济麻风医院，并将广济医院内原麻风病房改造为“麻风妇孺之家”，为麻风患者提供食宿、治疗、疗养和福音生活。在 19 世纪晚期现代医学无力治愈麻风病且英美世界采取强制驱逐“麻风中国佬”时代，杭州广济麻风医院所确立之“隔离疗养与福音洁净”模式，重传教轻治疗，既有某种程度的“身体的殖民”色彩，亦不可否认其为近代中国处置麻风问题带来“治疗、疗养和劳作”相结合的“卫生现代性”。

〔关键词〕福音医学；麻风救济；卫生现代性；身体的殖民；清末杭州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6)01-0088-11

按照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研究，杭州广济麻风医院是近代中国开办最早的教会麻风医院。他说英国圣公会“念中国麻疯之严重，睹麻疯人之惨痛”，由梅腾更(Duncan Main，又译为梅藤更、梅藤根等)“创痲病院于浙江杭州，旋又在广东北海办麻疯疗养所，此为教会开办痲病院之起始”^①。这家由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士梅腾更于 1882 年正式创办的教会麻风医院，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已经发展成为“以住院诊疗和收费低廉而著称以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②的专科医院。到 1952 年正式并入浙江省政府创办之武康麻风疗养院，杭州广济麻风医院存世 70 年，经历了晚清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麻风防治缘起、清末民初教会麻风院初步发展、20 世纪 20 年代民族主义大潮冲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伪统治与教会麻风院因应、抗战胜利后教会麻风院复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接受外国津贴之教会医院而被接管、改造为“人民卫生”一部分之全过程。笔者曾以该院为个案，讨论 20 世纪 20—30 年代福音医学、慈善救济与民族主义之多元关系^③，但对清末该院筹建和初期发展中之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传染病防治中“现代性”之隐喻，未有涉及。故此，本文拟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吉百利图书馆藏杭州广济麻风医院档案文献，结合报刊资料，对此问题，作一专题探讨。

一 “福音医学”救治麻风的开启

浙江是麻风病中低流行区域，历史文献中有关浙江麻风病流行记载亦较少。明代弘治年间，瑞安所军夏育女嫁给一位名叫一鶚的青年三个月后，一鶚“病痲，数年转剧”，直至死亡，该女不离不弃，最终殉情而亡^④。康熙《浙江通志》曾记兰溪县方满在婚后数年“患麻疯”，其妻徐氏不离不弃的故事^⑤。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麻风病隔离防疫史料整理与研究(1368—1978)”(20&ZD223)。

① 邬志坚：《中国扑灭麻疯运动》，《麻疯季刊》第 9 卷第 3 期，1935 年 9 月，第 26 页。

② 马雅各：“中国麻风病问题及其与基督教运动的关系”(James Maxwell, “The Problem of Leprosy in China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Christian Movement”),《麻疯季刊》(The Leper Quarterly)第 6 卷第 2 期(1932 年 6 月)，第 8 页。

③ 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114—135 页。

④ 乾隆《瑞安府志》卷八《列女》，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64 册，上海：上海书店 1993 年影印本，第 157 页。

⑤ 康熙《浙江通志》卷四一《列女》，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浙江第 2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 年影印本，第 575 页。

康熙《山阴县志》记该县胡亨奎“患麻疯死”事^①。康熙《会稽县志》记石浦村董栗娶鸡山村人樊氏“而董病癩”事^②。康熙年间,桐乡人夏尚贤妻孙氏许聘时“夫有癩疾”^③。上述麻风病人零散分布于浙江温州、金华、绍兴和嘉兴等地,与新中国成立后浙江麻风病调查分布情况基本吻合,“浙西嘉兴专区流行最为普遍”;浙东可分为绍兴、衢州、温州、丽水、宁波等中心^④。至于官办麻风院设置,明代景宁县曾设养济院,“原在会衢门外五十余步,明成化十九年主簿周廉建,久废。后徙于社稷坛北十余步,造草屋十余间,为孤贫栖身之所。因内多麻疯之人,真实孤贫不敢同住,遂为麻疯院”^⑤。景宁县麻风院在 1873 年(同治十二年)《景宁县志》刊刻前已毁,否则县志中当有“今存续办”字样。由此可知,在 1880 年前,浙江各地麻风病中低流行,贫苦无依之麻风患者,如麻风病中高流行区之闽粤之地一般,大都沦为乞丐;部分家境富裕之麻风患者,或尚能居家休养。省城杭州的情况大抵相同,当街有麻风乞丐,亦有部分麻风患者隐匿家中居养;城中虽有慈善机构,但并无专门收养麻风患者的麻风院。

杭州医疗传教会是英国圣公会在华医疗传教事业中“最古老和最大的医疗团之一”^⑥,始于 1872 年该会医疗传教士高厚德(Dr. James Galt)开办的戒烟所,后发展成为杭州广济医院。从医疗传教团“在杭州开始工作时起,一直有一定数量的麻风病患来接受治疗”^⑦。由于有限的床位和医疗物资首先要满足鸦片成瘾者的戒烟需求,不能直接供给麻风病患,因此,当时除少数重症麻风病患能够长期住院观察外,大多数轻症麻风病患通常只能接受门诊治疗^⑧。1879 年,高厚德医生退休,杭州广济医院需要一位新院长。1881 年 9 月 28 日,梅腾更携新婚妻子梅福孙(Florence Nightingale Main)启程来中国,于年末抵达杭州,就任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至此开启在杭州长达 45 年的医疗服务。

甫抵杭城不久,梅腾更就接触到这些居无定所、衣食不裹、缺乏医疗的麻风病患。英国圣公会驻浙江主教慕稼谷(G. E. Moule)观察到梅腾更“几乎从他第一次抵达中国时就感到对麻风病患进行特殊治疗的必要性”,因为杭州的麻风病患虽然“不像华南地区那么多,但他们经常出现,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⑨。梅腾更也发现“有麻疯者之来焉,拒之不得,纳之不可,益我以重负,几不可以终日”^⑩。他想要对杭城的麻风病患进行诊疗,但当时的广济医院并无足够的医疗空间和设备诊治此病。

1882 年年底的杭州广济医院,规模甚小,以大方伯戒烟所为主体的一栋二层小楼,上层为住院区,内含四间病房,总计 16 个床位,没有手术室;下层的门诊区配备药房,每月可诊治约 200 名门诊病人^⑪。为扩大治疗规模,在威廉·查尔斯·琼斯基金会(William Charles Jones Fund)、家乡友人、医院患者、中国官员以及在华外国人资助下,男子病房得以在 1884 年落成并投入使用^⑫。该病房拥有 100 张床位,既可收容肺癆、麻风等传染病患者,也可为戒烟者和其他病人提供住院医疗服务^⑬。对肺结核和麻风病这样的传染病而言,这一“混居”医疗空间并不理想。因此,梅腾更希望能筹措资金,为这些传染病人筹建专门的隔离病房。

1891 年,梅腾更回英国休圣诞假。期间,他认识了万国麻风救济会的一位委员,从该委员那里知

① 康熙《山阴县志》卷三四《人物志十二·列女一》,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雍正二年(1724 年)刻本,第 18 页。

② 康熙《会稽县志》卷二七《人物志·列女》,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 年影印本,第 588 页。

③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七《列女中·节妇》,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23 册,上海:上海书店 1993 年影印本,第 650 页。

④ 《麻风防治工作总结》(1954 年 12 月),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J176-001-233-067。

⑤ 同治《景宁县志》卷二《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64 册,上海:上海书店 1993 年影印本,第 286 页。

⑥ 《布道与医治:1901—1902 年度英国圣公会医疗传道会附属机构报告》(*Preaching and Healing: the Report of the C. M. S. Medical Mission Auxiliary for 1901—1902*),伦敦:英国圣公会书社 1902 年版,第 53 页。

⑦ 艾尔文:“杭州广济麻风院”(A. Elwin, “The Leper Hospital, Hangchow”),《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季刊》(*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Medical Mission Quarterly*)第 11 期(1895 年 7 月),第 60 页。

⑧⑨ 金斯顿·德·格伦奇:《杭州的梅医生:杭州医疗传教团的故事》(Kingston De Grunche, *Doctor Apricot of “Heaven Below”: The Story of the Hangchow Medical Mission*),伦敦:马歇尔兄弟出版社 1911 年版,第 43、33 页。

⑩ 慕稼谷:“杭州圣安德鲁节”(G. E. Moule, “St. Andrew’s Day at Hangchow”),《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92—12—06,第 3 版。

⑪ 梅腾更述,虞荣兴译:《杭州广济医会史略》,《浙江广济医报》第 2 卷第 3 期,1916 年 8 月,第 73 页。

⑫ 亚历山大·加米:《杭州的梅医生》(Alexander Gammie, *Dr. Main of Hangchow*),伦敦:皮克林与英格利斯 1935 年版,第 36 页。

⑬ 慕稼谷:“梅医生的新医院”(G. E. Moule, “Dr. Main’s New Hospital”),《字林西报》,1884—10—11,第 3 版。

晓万国麻风救济会对印度等地麻风救济有专门资助,于是他设想在广济医院东北角建一幢独立的通风建筑,“包括六个病房,每个病房有两张床;一个小教堂,饭厅,厨房和其他办公室,以及一道 70 英尺×20 英尺的围墙院子”^①。梅腾更的设想得到万国麻风救济会支持后,寻找一块单独且位置合适的麻风院地基成为当务之急。正当梅腾更为此焦虑时,广济医院相邻地方发生火灾,有 4 户住房被大火烧毁^②。经过交涉,院方买下这块土地作为麻风院地基。在万国麻风救济会和上海基督徒赞助下,1892 年 11 月 30 日,广济医院麻风院建成并投入使用。

随着入院麻风患者人数增多,广济医院麻风院很快不堪利用。梅夫人说:广济医院内麻风病房仅 12 张床位,但目前已收容 20 位麻风患者^③。艾尔文(A. Elwin,亦作“伊先生”)观察到,“虽然杭州的麻风病患不像一些华南城市那么多,但申请者也得让医院不堪重负”^④。梅腾更也在广济医院 1895 年年报中说:“在这一年里,我们收到许多入院申请。由于麻风院空间有限,其中一些人我们无法接待,这让我们非常遗憾。要把一个可怜的麻风病人拒之门外,说我们不能接待他,是非常困难的。”梅腾更希望筹建一个规模更大、收容能力更强的新麻风院,“无论如何,这些可怜的麻风病人应该呼吸新鲜空气,能够自己种植蔬菜、饲养母鸡和猪,可比现在更自由地活动。但现在他们被关在一个小院里”^⑤。1895 年年底,梅腾更得到钱塘县知县束允泰准许,从僧人本林手中租到玉皇山、栖云山和凤凰山之间的将台山平场,面积约数十亩,作为新院区建筑地基。然而,有绅董告发将台山平场系本林盗卖,束允泰告知梅腾更觅地更换。于是,梅腾更觅得西湖宝石山空地三段,共六亩五分二厘。该地系保俶寺僧管业,经仁和县知县伍桂生会同办理,由保俶寺主持学德徒弟怀仁断给,地价洋银一百零二元,即向僧人本林追价换地^⑥。梅腾更在钱塘县知县束允泰和仁和县知县伍桂生准许下,向僧人本林和怀仁先后租地购地置换,终获宝石山空地三段后,开始募集新院建筑资金,筹建肺病院、麻风院等。

1896 年 1 月,梅腾更在《字林西报》上向在华外国人发起数额为 1000 银元的募捐,得到上海外侨和基督教机构的助力。例如,在沪英国商人威厚阔(C. J. Dudgeon,亦称德贞)捐助 10 两银子,上海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捐助 75 两银子,基督教青年会捐献音乐会全部门票收入,其他个人和组织还捐助白银 70 两等^⑦。但是,募捐总数并未达到其期许,故而他将募捐目光投向远在伦敦的万国麻风救济会。最终,万国麻风救济会同意捐助 100 英镑建筑款。获得捐助后,梅腾更开始建设新麻风医院。据慕稼谷称:“目前,在著名的西湖岸边,正在建造一座新的麻风病院以及一座宽敞的疗养院,也可作为医疗助理的休息场所,距离医院只有短短一小时的步行路程……对麻风病患的善举,主要由万国麻风救济会资助,也得到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欧洲居民慷慨援助。”^⑧在这些个人和团体的帮助下,新的广济麻风医院落成。梅腾更说:“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西子湖滨昭庆寺岳王墓之间,购地一方,建院一座,遥对孤山放鹤之亭,麻疯者得迁于此。”^⑨1897 年,广济医院麻风院整体搬迁至西湖边宝石山麓新麻风医院^⑩。

在经营广济医院麻风院过程中,梅腾更夫妻发现麻风女患者及无依靠之麻风患者子女教养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梅腾更曾在门诊中收治了一位麻风女病患,“手、脚和面部症状明显:部分脚趾

① 慕稼谷:“杭州圣安德鲁节”,《字林西报》,1892—12—06,第 3 版。

② 这场大火,可能发生于 1891 年 12 月中旬(参见《武林火患》,《申报》,1891 年 12 月 24 日,第 2 版)。

③ 梅福孙:“漫步杭州医疗传教团”(Florence Main,“A Walk Through the Hangchow Medical Mission”),《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Mercy and Truth, A Record of C. M. S. Medical Missions)第 1 卷(1897 年),第 16 页。

④ 艾尔文:“杭州广济麻风医院”,《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季刊》第 11 期(1895 年 7 月),第 61 页。

⑤ 梅腾更:“杭州医疗传教团 1895 年年报”(Dr. D. Main,“Hangchow Medical Mission, Report for 1895”),《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季刊》第 16 期(1896 年 10 月),第 100 页。

⑥ 《宣统元年二月巡抚增韞复外务部咨英国梅医士购买宝石山地案》,民国《杭州府志》卷 174《交涉》,1922 年铅印本,第 17 页。

⑦ “杭州广济麻风医院”(“Hangchow Leper Hospital”),《字林西报》,1895—12—23,第 3 版。

⑧ 慕稼谷:“杭州广济医院史”(G. E. Moule,“History of the C. M. S. Hospital,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 1 卷(1897 年),第 85 页。

⑨ 梅腾更述,虞荣兴译,《杭州广济医会史略》,《浙江广济医报》第 2 卷第 3 期,1916 年 8 月,第 74 页。

⑩ 黄凌萃:“杭州广济麻风医院简史”(Wang Lin-zei,“A Brief History of the Hangchow Leper Hospital”),《麻风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27 年 5 月),第 21 页。

已经脱落,手和脚病发部位麻木无感”^①。这位麻风女患者需住院治疗,但医院并无专门的病房。至于无依靠之麻风患者子女,梅腾更称:“若辈之幸安,自不待言,而其子女,或冻或饿,无人人知。鄙人目击其惨,泪至沾襟。”^②梅夫人曾向万国麻风救济会特别申请额外资助一位两岁小男孩——他是麻风患者阿四最小的孩子,“这个小家伙被称为‘圣公会之子’(C. M. S. Child)”^③。当宝石山麓新麻风院开始筹建后,梅腾更夫妇认为利用广济医院内原麻风院病房创办专门的麻风妇孺之家的时机已成熟。1896年,梅腾更提议设立专供麻风子女居住的“儿童之家”(Children's Home),并雇佣一位信教护工照护这些孩子^④。等到男麻风患者正式迁往宝石山麓新麻风医院后,广济医院内原来的麻风院转而成为专门收治女麻风患者和麻风患者幼孩的麻风妇孺之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麻风医院的名称经历了从“麻风收容所”(Leper Refuge)到“麻风之家”(Leper Home)的转变。从词义上看,“收容所”虽然突出麻风患者从流离失所到有固定住所的转变,但“收容”一词带有强制意味。比较而言,“麻风之家”更具人文色彩和人道主义。首先,广济麻风医院给予这些无立锥之地、被社会所抛弃的麻风患者一个“有形”的家,弥合了其原生家庭和社会对其“抛弃”、令其“流离失所”的伤害和裂痕;其次,“麻风之家”也安置麻风患者的孩子(有些孩子是健康的,有些孩子也是麻风患者),让其在麻风院中重建完整家庭;最后,教会举办的“麻风之家”,还有精神和信仰之家的意思,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在此基础上,这种对“家园”的普遍归属感使得明清时期带有污名色彩的、被动的“强制隔离”转变为强调“福音”拯救之主动的“人道隔离”。

随着19世纪海外志愿传教运动兴起,大量英美基督新教的医疗传教士被派驻到亚非拉诸多国家和地区,“手术刀”和“十字架”并重的“福音医学”模式成为主流传教模式之一。作为医疗传教士,梅腾更接办杭州广济医院,并创办麻风医院,收治麻风患者,其目的,梅腾更自己总结称:“吾侪之济世救难,栽培人才,宣讲福音之唯一宗旨,亦赖医院之发展而澎涨之。”^⑤一方面,麻风医院为原本未被收治、未被收养的麻风患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现代医学治疗和收养,体现了“卫生现代性”;另一方面,该院创设之初就十分注重对麻风患者进行“福音洁净”,使得麻风医院具有“身体的殖民”的性质。“卫生现代性”彰显作为“科学”的现代医学对麻风病防治的价值,而“福音洁净”突出的却是麻风病在基督教“神学”中的“信仰与洁净”。梅腾更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麻风病防治的“福音医学”模式。进入20世纪后,梅腾更主持的杭州麻风救济事工,继续探索和践行“疗身”中的“卫生现代性”和“疗灵”中的“身体的殖民”相结合的“福音医学”模式。

二 疗身中的“卫生现代性”

梅腾更与医院同事关系融洽。杭州广济医院同事诗曰:“滕良先生本姓梅,泰西医士子为魁。旧年抛得杭州去,今念杭州又欲回……闻道来华已有期,拟于冬至一阳时……吾侪日日望行旌,欲整衣冠出郭迎。”^⑥梅腾更于1900年年底结束休假,返回杭城,同样受到杭州广济医院同仁热烈欢迎。重回广济医院及广济麻风医院的梅腾更,继续投入大量精力于杭州的麻风救治工作。他在1902年年报中说:“在另一个部门,已经有很大改进,即把所有麻风患者安置在西湖边麻风之家。这个麻风之家取得巨大成功。相比于城内的麻风收容所,麻风之家里的麻风患者享有更多自由,尤其在种植和钓鱼等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会了阅读,并且是基督徒。”^⑦对于宝石山麻风医院的成功,梅腾更聚焦于两点:一是麻风患者得到收治和疗养;二是麻风患者得到“福音”。这两点分别对应梅腾更办理麻风救治

① 梅腾更:“杭州广济医院门诊日志,1889年2月12日”(D. Duncan Main, "An Out-Patient Day at the Hangchow Hospital, 12th February, 1889"),《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第3卷第3期(1889年9月),第116~117页。

②⑤ 梅腾更述,虞荣兴译:《杭州广济医史略》,《浙江广济医报》第2卷第3期,1916年8月,第73、72页。

③ 《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894年第20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wentieth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894),伦敦:约翰·F·肖公司1895年版,第52页。

④ 《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895年第21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wenty-First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895),伦敦:约翰·F·肖公司1896年版,第48~49页。

⑥ 《伫听履声》,《画图新报》第11年第10卷,1891年2月,第106页。

⑦ 《布道与医治:1901—1902年度英国圣公会医疗传道会附属机构报告》,第53页。

事业的两大主旨,即给予麻风患者“现代医学”和“福音救济”,前者代表西医进入中国后的“卫生现代性”,后者预示着对麻风患者“福音洁净”,两者结合,体现了“福音医学”的基本内涵。“疗身”方面,梅腾更在杭州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麻风患者的收治。广济麻风医院的麻风患者,一部分是门诊病人,一部分是梅腾更在外出诊疗中遇到的。例如,1903年年底至1904年年初,梅腾更称他在杭绍途中遇到一位麻风患者坐在路旁,症状明显,“他的眼睛、鼻子和嘴空余4个小洞——太可怕了”^①。作为医生,梅腾更都觉得麻风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故他将这位麻风患者收容到广济麻风医院中。1903—1912年间,广济麻风医院每年收治在院的麻风病患35人上下,其中1903年收治43人,为十年中最高人数;1904年则突然下降到29人,为十年中收治人数最低值;1905年又增到42人;其余七年中,1906年、1907年均为33人,1908年、1909年和1911年均为38人,1910年为37人,1912年为35人^②。每年收治的30余位麻风患者,其实不包含广济医院内妇孺之家中收养的孩子。梅夫人称:“在我们的照顾下,有12个孩子,其中6个是未被传染的麻风病患孩子,由万国麻风救济会负责经费。”^③除了妇孺之家中未被感染的麻风患者子女不需要诊疗外,广济麻风医院收容的30余名麻风患者,或多或少都需要诊疗。

其次,麻风患者的治疗。1893年,广济麻风医院收容15位住院病人,年龄从16岁到54岁不等;疾病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只有一部分家境殷实的有望在治愈后重新回到朋友和家庭之中^④。梅腾更给予这些麻风患者以相当程度的“西药”诊疗。他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曾经尝试过各种药物和治疗方法。但是,后来我们倾向于对麻风患者进行简单症状治疗,以维持病人消化功能正常并保持他们的体力(为目标)。”^⑤1906年,有37名麻风患者在麻风之家接受治疗,梅腾更说:“我们为他们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良好的食物和新鲜的空气似乎可以阻止麻风病恶化,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治疗麻风的方法。”^⑥在1907年的报告中,葛崇德说:“工作情况与往年基本相同,尽管人数略有增加,而且由于需要更多的床位,还增加了一些建筑。我们不能像其他病人那样把麻风患者安排在一个房间,(因为)麻风患者经常性发生溃疡、烂疮,致使其腿和胳膊等溃烂,必须不断地换洗衣服。在过去一年里,院里有3位(2男1女)麻风患者不治而亡。”^⑦广济麻风医院尝试药物治疗麻风病,但效果寥寥,故只能通过维持或提升麻风患者自身抵抗力和免疫力,以抵抗麻风杆菌的侵蚀,这也是梅腾更提及的广济麻风医院专注于“简单症状治疗”“维持病人消化功能和体力”以及强调“疗养”的原因。

再次,基于麻风防治诊疗实践,推断麻风病理。麻风病学的进步缓慢,不仅表现在麻风病治疗药物上,对于“食物营养与麻风病”关系的认知,也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认为麻风病因与“鱼”有密切关系。哈钦森(Jonathan Hutchinson)曾引用一位在广州的医疗传教士关于鱼和麻风病关系的论断,提出劣质、不熟和烹饪不当的食物可能是麻风病的诱因。该医疗传教士曾在广州见过这种疾病,认为麻风病不是遗传性疾病,也没有遇到过疑似具有传染性的病例,因为当地非常贫困,没有采取任何预防传染的措施,造成麻风病流行的共同因素是“腌制”或“不新鲜”的

① “梅腾更杭州来信”(“Dr. Main's Letter from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8卷(1904年),第38页。

② 据1903—1912年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年报登载数据整理而成。

③ 梅福孙:“杭州妇孺之家”(Mrs. Main, “The Women's Hospital,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11卷(1907年),第399页。

④ “中国的麻风患者”(“The Lepers in China”),《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893年第19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Nineteenth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893),伦敦:约翰·F·肖公司1894年版,第71页。

⑤ “杭州的光与生命:梅医生年度报告摘录”(“Light and Life in Hangchow: Extracts from Dr. Main's Annual Report”),《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9卷(1905年),第362页。

⑥ “杭州”(“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11卷(1907年),第345页。

⑦ 葛崇德:“杭州麻风收容所”(A. T. Kember, “The Leper Refuge at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12卷(1908年),第171~173页。

鱼^①。对此,梅腾更并未人云亦云。他在广济麻风医院 1905 年年报中说:“麻风病显然是一种多见于中年早期的疾病。我们从未在老年人中遇到过这种疾病。至于病因,我们尚未有结论。在中国这一地区,我们不能说它可能与食用腐烂或未完全腌制的鱼有关,因为中国人基本上都吃鱼,而且常常吃腌鱼。到目前为止,我们医院里还没有一个不吃鱼的麻风患者。在因果关系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与个人传染完全不同的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什么还没有得到证实。死亡主要是由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并发症或由疾病引起的衰弱造成的。”^②按照梅腾更的看法,广济麻风医院内麻风患者的患病原因,与“食鱼”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紧密。从这一点来看,梅腾更既关注国际麻风医学界对麻风病理学的最新研究,也没有亦步亦趋地认同权威观点,而是据其门诊和住院病患的医疗实践,探究麻风病理。

最后,“隔离疗养”的推行。在 1904 年广济麻风医院报告中,梅腾更提到麻风患者的“疗养与治疗”问题。他说:“在城外我们可爱的西湖边,在那里,麻风们享受新鲜空气和美丽环境:他们能够划船、钓鱼和从事园艺,非常快乐。良好的食物和新鲜的空气往往能阻止麻风恶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③在 1906 年年报中,梅腾更再次强调:“我们的家园位于西湖边,为麻风提供了自由的机会。他们有船,可以用来在湖上捕鱼;他们有蔬菜,可以种在自己房间外的花园里;他们有一些兴趣,可以让自己忘记那令人厌恶的疾病。当然,只要他们的手脚不被持续恶化的疮和畸残所影响,他们就可以享受这些东西……我们相信,他们因希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没有痛苦、没有疾病而感到高兴和喜悦。”^④“疗养”理念的引入,让麻风患者的生命得到一定程度延长。梅腾更在核对宝石山麻风医院内住院名单时发现,住院最久者已达 15 年,住院最短者为 2 个月。具体来说:住院 10—15 年者有 5 位,6 年者 1 位,5 年、4 年和 3 年者有好几位,还有 1 位住了 4 个月,有 2 位住了 2 个月。这表明,在“现代医学”有关麻风病防治药物研发得到突破之前,“隔离疗养”的现代医学预防和休养观点,对麻风病防治来说,是有价值的。

从“现代医学与麻风诊疗”关系看,广济麻风医院推行的“隔离疗养”,既是“强制隔离与相对隔离”的区分,亦是“药物有限论和疗养有效论”的融合。梅腾更主张对麻风患者进行“隔离治疗”,但并非“强制隔离”,即强令所有麻风患者入院治疗不得出院,而是“相对隔离”,即自愿入院隔离。例如,1908 年梅腾更夫妇休假,广济麻风医院 40 名麻风患者由葛崇德医生(Dr. Arthur. T. Kember)负责。他在 1909 年年度报告中写道:这一年医院总计接收 15 位新的麻风患者。在接受短暂治疗后,有 3 人因治疗效果没有立竿见影感到失望而自行离开,其余 12 人均自愿住院,“这些病人在意识到自己患有麻风病之前已经遭受了 7—12 年不等的病痛折磨,直到手脚残废,以至于丧失自我生存的劳动能力时,他们才意识到来投奔麻风医院”^⑤。麻风患者“自行离开”和“自愿住院”,即是“相对隔离”的具体表现。此外,限于当时国际麻风防治界尚未研制出有效诊治麻风病的“西药”,所谓“隔离治疗”,只能是“隔离后的有限治疗”。在此情况下,梅腾更转而更加强调“疗养”的效能,强调“隔离疗养”对麻风病防治的价值。如果说“西药”对麻风病的诊疗是硬治疗,那么,“疗养”就是一种软治疗。如果将梅腾更倡导的“隔离疗养”与同时代国际麻风防治界提倡的“强制隔离”比较,两者不仅仅是“强制隔离”还是“相对隔离”的区分,更是“收容”与“疗养”的区别。

梅腾更的“隔离疗养”模式,是“现代医学与福音救济”相结合的“福音医学”模式。这种“福音医学”模式,既具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作为“科学”的现代医学与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的二元性,

① 乔纳森·哈钦森:《论麻风病与食鱼习俗》(Jonathan Hutchinson, *On leprosy and Fish-Eating*), 伦敦:康斯特布尔出版社 1906 年版,第 210 页。

② “杭州医疗传教团:梅医生年度报告节选”(“Hangchow Medical Mission: Extracts from Dr. Main's Annual Report”),《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 10 卷(1906 年),第 364 页。

③ “杭州的光与生命:梅医生年度报告摘录”,《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 9 卷(1905 年),第 362 页。

④ 《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 1905 年第 31 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05*),爱丁堡:达里恩出版社 1906 年版,第 26 页。

⑤ “杭州”(“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 13 卷(1909 年),第 250—251 页;《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 1909 年第 35 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hirty-Fifth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09*),爱丁堡:达里恩出版社 1910 年版,第 22 页。

亦具有以“疗身”为主的“相对隔离”的现代医学场所与以“疗灵”为主的“强制隔离”的宗教空间的二元性。清末根治麻风病的特效药尚未问世,麻风病仍被视为绝症。梅腾更“虽会用尽方法减少患者之痛苦,有时亦似奏效,但终归没有灵验”^①。作为医疗传教士,梅腾更相信以麻风医院为宗教空间的“福音洁净”能有效“洁净”麻风患者,“使痛苦得以缓解,福音得以传扬,让这些可怜的人们得到帮助和照顾,并获得超越死亡、痛苦和罪恶的希望”^②,作为“科学”的现代医学让位于“神学”的“福音洁净”。在广济医院麻风医院,传教士、慕道友、基督徒和圣经女等令那些“相对隔离”的麻风患者始终处于浓郁的基督教“福音洁净”的“强制隔离”氛围中。在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之下,让麻风患者“在经历悲惨的生活之后,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光荣复活的希望……召唤他去更快乐、更美好的地方”^③。这样一种“福音洁净”的强制隔离,不得不说是“身体的殖民”。

三 疗灵中“身体的殖民”

福音洁净麻风,是基督教神迹的见证。对于每一位医疗传教士来说,没有比令麻风患者皈依更能向异教徒证明上帝的恩典。广济麻风医院建立伊始,梅腾更将扩大医院规模放在首位,例如为医院的日常运行和购置医疗器材争取资金,在出诊过程中结交在杭中外官员和商人以争取支持。繁忙的医疗事务使梅腾更无暇直接向病人传播基督教教义,不得不将传教活动渗透于医疗救治之中。对于门诊病人,梅腾更时常会安排一位助手或亲自作为布道者,向在候诊室的病人介绍获得基督救赎的方法;对于住院患者,梅腾更并未强制要求其参与宗教活动,也很少亲自陪同参与,而是希望所有活动方便的患者都能自愿来教堂做礼拜、读圣经、忏悔和祷告^④。随着麻风医院的建设工作基本完成,梅腾更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病人个体的福音关怀,从而提升基督教在病人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疗灵”中“身体的殖民”,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麻风医院成为密闭的宗教空间。广济麻风医院成立后不久,所收治的患者中,有10人是基督徒,6人是慕道友。这些麻风患者,原本不是或至少不都是基督徒或慕道友,他们在进入广济麻风医院后,逐渐转变为基督徒或慕道友。梅腾更说:“我们尽最大努力缓解他们的症状,治愈他们的溃疡,并努力使他们快乐。我们每天教他们读圣经,听他们讲解福音,我们为福音能给无望的麻风患者带来希望和安慰而欢欣鼓舞。”^⑤1907年3月造访杭城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史蒂文斯(Rev. H. E. Stevens)在其印象记中写道:“三英里外,在美丽的西湖边,是麻风医院,有27名患者。在院内,麻风患者不仅找到一个可以满足他们暂时需求的家,而且其灵魂也得到安慰,因为福音给了他们希望。一位传教士提到,他经常发现一个麻风患者在教另一个麻风患者读《新约圣经》,或者参与祷告——所有麻风患者都衷心地参加主日礼拜。”^⑥在地上葡萄园中“洁净”麻风是传教士的福音使命,也是皈依麻风患者获救的希冀和路径。麻风医院内“每天”进行的布道、读经、讲福音活动,实际上将“有形”的医疗场所打造成了“无形”的宗教空间。更有甚者,由于麻风患者“相对隔离”于麻风病房及后来独立的宝石山麻风医院内,这种“无形”的宗教空间,也变得“密闭”,使得“相对隔离”转变为“无处不在”的“强制隔离”。

第二,“福音洁净”与“身体的殖民”的具象化。对于麻风患者而言,杭州广济麻风医院的“福音疗灵”,使得这些原本对生命无望的人寻找到另一条“重生”的路径,即所谓“上帝佑我,使我起死回生”^⑦,以宗教的“洁净”治愈病体。梅腾更列举一位麻风患者临终的故事:“有一两个人已经从痛苦中

① 麦雅谷口述,张国华译:《中国麻疯之治疗》,《麻疯季刊》第2卷第2期,1928年7月,第8页。

② 《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907年第33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hirty-Thir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07),爱丁堡:达里恩出版社1908年版,第28页。

③ 《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910年第36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hirty-Sixth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10),爱丁堡:达里恩出版社1911年版,第24页。

④ 亚历山大·加米:《杭州的梅医生》,第49页。

⑤ 艾尔文:“杭州广济麻风医院”,《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季刊》第11期(1895年7月),第60~61页。

⑥ 史蒂文斯:“访客眼中的杭州印象”(H. E. Stevens, “A Visitor's Impressions of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11卷(1907年),第217页。

⑦ 张学彬:《杭州广济麻疯院病人之建议》,《麻疯季刊》第5卷第1期,1931年3月,第54页。

解脱出来,回了老家。他的最大愿望是耶稣带他回家,在他死前的几天里,他只说了一句话:“Dzi, dzi”(谢谢)。他对(基督)的信仰和信任是非常真实的,让我们相形见绌、自愧不如。”^①一位麻风女在临终前对床边的梅医生低语道:“医生,他们曾因我容貌出众而称赞我为‘美女’,但如今我的脸因病症而变得残破不堪,令我感到万分羞愧。我很快会得见耶稣,届时一切不洁都将消散,只剩下永恒的纯粹和洁净。”她相信“即使曾为麻风之躯,如今也为耶稣之血所洁净!”^②麻风患者丑陋不堪的肉体经过“福音洁净”后成为灵魂纯粹洁净的基督徒,这便是广济麻风医院隐藏在“疗灵”中的“身体的殖民”对“疗身”无效的麻风患者的拯救。在1904年年报中,梅腾更说:“自从来到我们这里后,麻风患者中大多数人成了基督徒。其中一些麻风患者尽管身体不幸残缺畸形,但却非常聪明。例如可怜的林靖(Kyin Lin),他不停地祈祷,似乎生活在天堂中,欢乐不断地从其盲眼中流露出来。他的信仰如此虔诚,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自愧不如。”^③在麻风医院“隔离”的医疗空间中,麻风患者丧失对宗教信仰的自主选择权,因“疗身”而被强制“疗灵”,基督教对麻风患者“身体的殖民”由此具象化。

第三,麻风患者的“洁净”是见证。首先,在梅腾更和梅夫人等传教士看来,“洁净”麻风是他们在杭州工作成功的见证。1893年9月,广济麻风医院迎来了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麻风患者^④。梅腾更在年报中说:“在精神上,麻风院充满希望和承诺。在这一年里,有一位患者接受了洗礼,不久之后,我们预计会有三到四位患者被接受进入教会。”^⑤梅夫人说:“我们相信更多的人将学会认识和热爱主耶稣,他治愈患者和洁净麻风能力已经成为(基督徒)喜闻乐见的故事。”^⑥1899年,梅腾更感叹:“麻风工作是悲哀而有趣的。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比日复一日地探访这些可怜人,看到疾病慢慢地,但肯定地吞噬他们的生命更令人痛苦。我们努力让他们高兴,安慰他们,并尽我们所能减轻他们的痛苦。”^⑦慕稼谷、梅腾更夫妇、艾尔文、葛崇德等传教士都认为,“在杭州对麻风患者开展福音工作是真实有效的”^⑧,宝石山新麻风院取得巨大成功,麻风患者在新家似乎非常快乐^⑨。

其次,对于麻风患者来说,皈依后向同胞传道是“洁净”的见证和延伸。梅腾更于1897年向英国圣公会汇报一位名叫“陶阿三”的麻风患者皈依的故事。阿三第一次住院时就聆听了救赎故事。由于麻风无法治愈,阿三只能出院回乡下家中。不久,阿三听说美国长老会一位传道人在他家乡讲道后赠送药品,于是请求该传道人赠药以治疗他的麻风。传道人告诉阿三,“唯一能帮助他的药是对基督的信心”。此后阿三便成了一位虔诚的慕道者,受洗后再次入院治疗,“在良好的食物和治疗下,他的病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回家后他开始为基督热心地做见证,“虽然他的身体正在崩溃,但他的灵魂却得到了安息。这就像麦粒落在地里,死后可以结出果实”^⑩。梅夫人于1898年讲述了一位麻风女的故事。一位从南京教会学校转来的19岁麻风女,是基督徒,对圣经有很深的认识。她在入院治疗后主动承担圣经女职责,教导另外两位与她做伴的麻风妇女,“她们需要我们的祈祷、耐心和安慰。我们非常感谢善心朋友不时给他(她)们寄来小礼物。如果这些可怜的麻风患者能够得到温暖的袜子、安慰品或任何可能给他(她)们的悲伤生活带来一点额外快乐的东西,我们将更加感激”^⑪。对“麻风之

①⑦ 梅腾更:“有位麻风病人来到他面前”(D. Duncan Main, “There Came a Leper to Him”),《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3卷(1899年),第167页。

② 亚历山大·加米:《杭州的梅医生》,第51页。

③ “杭州的光与生命:梅医生年度报告摘录”,《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9卷(1905年),第345页。

④ “中国的麻风患者”,《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893年第19年度报告》,第72页。

⑤ “杭州医疗传教团:梅医生来信”(“Hangchow Medical Mission; Letter from Dr. D. D. Main”),《教会传道会医疗传道季刊》(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Medical Mission Quarterly)第6期(1894年7月),第22页。

⑥ 梅福孙:“漫步杭州医疗传教团”,《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1卷(1897年),第16页。

⑧ “梅医生杭州来信”(“Dr. Main's Letter from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9卷(1905年),第133页。

⑨ 葛崇德:“1897年杭州回望”(A. T. Kember, “A Retrospect of 1897 from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2卷(1898年),第192页。

⑩ 梅腾更:“一个麻风患者的故事”(D. Duncan Main, “The Story of A Leper”),《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1卷(1897年),第130页。

⑪ 梅福孙:“杭州广济妇孺之家”(Florence N. Main, “The Women's Hospital at Hangchow”),《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2卷(1898年),第39~40页。

家”中收养的无依靠之麻风患者子女,梅腾更直言不讳,“孩儿之在院中,耳之所闻者,圣道之诚;目之所视者,明哲之则。自幼而壮,俨然一品学兼优之子”^①。所谓圣道明哲,均为基督教教义。

最后,“洁净”异国麻风患者是基督徒的职责。梅腾更始终相信,“通过我们目前拥有以及上帝赐予我们的一切手段,尽可能地为这些可怜的受难者提供幸福安宁的当下生活以及一个确定的未来愿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寄希望于那些用祈祷和金钱支持我们的人”^②。梅腾更不断在书信、年报等材料中向英国圣公会、万国麻风救济会和基督徒讲述其在杭州“洁净”麻风患者的成效,以此唤起英帝国教会组织和基督徒投入海外麻风救济事业。1902年广济麻风医院年报称:“几乎所有人都学会阅读,并且是基督徒。”^③1908年,麻风医院“有三人受洗,其中两人由为麻风患者们主持过四次圣餐仪式的慕稼谷主教亲自洗礼。在这些仪式中,平均有19名圣餐者参加”^④。1903—1912年间,广济麻风医院内麻风患者中基督徒占比最高的是1911年,是年全院38名麻风患者中有31名基督徒,占比81.6%,其中新受洗者4名;基督徒占比最低的年份是1905年,42名麻风患者中有基督徒14人,占比33.3%,低于1903年(37.2%);其余年份中,1904年和1908年占比均为55.0%;1906年和1907年分别为66.7%和63.6%;1909年占比73.0%,1910年占比75.7%,1912年占比74.3%^⑤。杭州广济麻风医院“福音洁净”成效明显,达到梅腾更“隔离疗养”麻风患者的目的,也实现了捐助杭州广济麻风医院的基督徒的愿望。

杭州广济麻风医院的“福音洁净”是否带有强制性?虽然梅腾更在多个场合声称麻风患者参加宗教活动凭其兴趣和热情。但是,麻风医院内浓郁的宗教气氛以及对贫穷麻风患者不收住院费用的措施,吸引了那些想要治疗麻风病的患者前往隔离疗养。在此过程中,传道士讲道、圣经女读经文、慕道友分享皈依故事、餐前祷告、主日崇拜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麻风医院内的麻风患者。加之麻风患者原本活命无望、生活困顿、境遇悲惨,比较容易在这样的场景中“被动”皈依。皈依的麻风患者说:“我们时常可以听到福音,享用灵魂的食粮,以使我们一天天接近上帝,即我们的天父;我们确信,如果我们确能为我们的罪忏悔,并且虔诚地信赖耶稣基督,我们将会死后永享天堂的幸福。”^⑥从这个角度看,进入麻风医院隔离疗养的麻风患者,其实没有多少选择。固然福音医学必然涉及“福音洁净”问题,但如杭州广济麻风医院这样麻风患者基督徒占比接近61.0%,年平均皈依率占12.0%,充分证明梅腾更的福音医学理念的效度和宽度。在麻风医院内,麻风患者的“肉体”得以安置和诊疗,其“灵魂”也无时无刻不处于“福音洁净”之中,看似“相对隔离”的麻风患者,在“福音洁净”中丧失对宗教信仰的自主选择,“一日在院,日日疗灵”,广济麻风医院内密闭的宗教空间,构成“强制隔离”的“疗灵”过程中的“身体的殖民”。

四 结 语

19世纪中期,英帝国及其殖民地遭遇麻风重新流行这种被建构的“帝国的危险”。1873年,麻风杆菌的发现否定了1867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医师学会全球麻风调研报告为解决“帝国的危险”而开出的“毋庸隔离”药方;1897年,第一届世界麻风大会提倡“筹建麻风院以强制隔离麻风”方案再次否定了“强制驱逐麻风中国佬回中国”的药方,此药方为19世纪90年代在香港西医书院任教的医生康德黎参加英国国家麻风基金组织的麻风调研征文所开^⑦。在此背景下,在万国麻风救济会资助下,梅腾更夫妇创建英国圣公会杭州广济麻风医院,开启福音医学与麻风救济合奏的生命乐章。

① 梅腾更述,虞荣兴译:《杭州广济医会史略》,《浙江广济医报》第2卷第3期,1916年8月,第74页。

② 《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908年第34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hirty-Fourth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08),爱丁堡:达里恩出版社1909年版,第25页。

③ 《布道与医治:1901—1902年度英国圣公会医疗传道会附属机构报告》,第53页。

④ 葛崇德:“杭州麻风收容所”,《仁慈与真理: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工作纪实》第12卷(1908年),第171页。

⑤ 据1903—1912年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年报登载数据整理而成。

⑥ 《印度及东方麻风救济会1912年第38年度报告》(Mission to Lepers in India and the East, The Thirty-Eighth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12),爱丁堡:达里恩出版社1913年版,第24页。

⑦ 参见周东华:《19世纪下半叶“麻风中国佬”污名的建构》,《历史研究》2025年第8期,第136—159页。

一方面,是福音“洁净”麻风传统的延续。中世纪欧洲社会麻风病流行,麻风患者被视为“不洁净”者,隐喻着罪恶和救赎。基督徒以上帝“洁净”麻风故事为榜样,将“洁净”麻风视作虔诚信徒最基本的准则。梅腾更将医疗传教士的工作概括为:“让中国人‘入教’,正如他们所称,并不是传教士或教会的全部工作。医治病人;喂养饥饿的人;洗涤污浊,然后让他们洁净,并且保持洁净;安慰悲伤的人;抚慰和同情;让人们快乐,帮助他们保持微笑,通过忘记自己,提升他们的思想;引导他们进入更高的目标,走向更高的事物。这些在我看来是福音的一些真正目标。我们绝不应该忽视,我们归根到底代表着那位希望完全拯救身体和灵魂的主。”^①在梅腾更看来,“入教”和“医治”实际上分别对应上帝对麻风病人灵魂和身体的拯救,二者不可偏废。梅腾更坚信让麻风患者“吃饱穿暖,安心劳作,祷告赞美,是基督福音最实在的见证与阐释”^②。另一方面,是医学“治疗”麻风新理念的开启。与普通传教士不同,梅腾更受过专业医学训练,是持证行医的医生。作为医生,梅腾更主持的广济麻风医院,不再纯粹以福音“洁净”麻风作为“伟大医生”隐喻的见证,他还通过现代医学“治疗”麻风作为“伟大医生”隐喻的另类见证。在麻风“治疗”领域,虽然梅腾更在年报中反复强调尚无“治愈”麻风的“良药”,但通过充足的食物、新鲜的空气、优质的护理、简单的劳作和一定程度的医疗以及努力探索麻风病理等,还是给清末中国麻风救治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从这个角度看,福音医学中“卫生现代性”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杭州广济麻风医院的历史场域中,医疗传教士处置麻风病中的“卫生现代性”与“福音洁净”相遇。前往麻风医院者绝大部分是贫民之辈,他们去的目的是“有饭吃和有药治”,福音与皈依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但是,麻风医院浓郁的福音气氛似乎成为“有饭吃和有药治”的前提,无论其是否治愈或康复,福音贯穿其生命全过程。相对隔离的教会麻风医院原本是“隔离疗养”的医疗场所,但因“福音洁净”而转变为无形的“强制隔离”的宗教空间。即便有一些麻风患者主动表露信仰,自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否认另有一些麻风患者以及妇孺之家中收养的麻风患者子女,成为福音医学以“洁净”之名行“身体的殖民”的对象。换句话说,医疗传教士推行“疗身与疗灵”并重的“福音医学”模式,与麻风患者的治疗、疗养和信仰的诉求之间,构成压制性关系。麻风患者唯有服从“福音洁净”才能获得治疗与疗养,这就是“福音医学”救治麻风病中的“身体的殖民”。

福音医学合奏生命乐章之意在于强调福音医学通过“疗身与疗灵”,既治疗或治愈病体,亦“洁净”麻风患者灵魂。在新教全球扩张的思想背景之外,梅腾更的麻风救济理念实际上还是对明清时期“强制隔离”的一种“在地化”(Localisation)的回应。传教士剔除了传统中国麻风隔离的“强制性”,转而给予患者身体上的疗养和精神上的劝慰。虽然 20 世纪初西方医学并未研发出针对麻风病的特效药,晚清医疗传教士也没能给麻风救济带来新的技术,他们针对麻风患者的医疗工作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疗养”,但他们还是带来了有别于明清时期麻风救济的新理念,即兼顾对患者身体和心灵的疗养,使其在麻风医院中安度余生。在肯定福音医学奏响麻风生命“高音”的同时,必须看到福音“洁净”麻风具有“身体的殖民”的“低音”。清末杭州广济麻风医院如此,民国时期亦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福音医学与麻风救济合奏生命乐章并不如明清以来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创建的麻风院。毕竟,中国麻风院虽然定额不足以收容地方全部麻风患者,但却是真正的儒家文化和慈善精神的体现。相比之下,福音医学救济麻风事工,是一种跛足的慈善实践。

收稿日期 2025—03—11

作者周东华,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1121;朱相龙,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剑桥,CB23RH。

① 亚历山大·加米:《杭州的梅医生》,第 51 页。

② 梅腾更:“新杭州广济麻风医院”(David Duncan Main,“New C. M. S. Leper Hospital, Hangchow”),《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第 47 卷第 2 期(1916 年 2 月),第 135 页。

Hygienic Modernit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Body: A Study of Leprosy Relief Through “Gospel Medicine” in Hangzhou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ou Donghua and Zhu Xianglong

Abstract: Hangzhou was a region with low to moderate prevalence of lepros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no leprosy hospital had been established to isolate and accommodate pati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aking charge of Guangji Hospital in Hangzhou, Dr. Duncan Main established the Guangji Leprosy Hospital with funding from the Mission to Lepers, Christian groups and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ry. This hospital specifically admitted male leprosy patients. The original leprosy wards within Guangji Hospital were renovated and upgraded into the “Home for Women Lepers and Their Children”, providing accommodation, treatment, convalescence, and spiritual care for leprosy patients.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when modern medicine could not cure leprosy and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enforced the forced expulsion of “Chinese lepers”, the “isolation-convalescence and gospel purification” model established by Hangzhou Guangji Leprosy Hospital prioritized missionary work over medical treatment. While this approach carried a certain degree of “colonialization of the body,” it undeniably introduced a “hygienic modernity” combining “treatment, convalescence, and labor” to China’s approach to leprosy management in the modern era.

Keywords: Gospel Medicine; Leprosy Relief; Hygienic Modernity; Colonization of the Body; Hangzh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张秀丽】

(上接第 16 页)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uhou* and *Bangbo*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Xu Y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arly documents such as *The Book of Documents* (Shangshu), “Bangbo” generally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he vassal system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Most of “Bangbo” i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obeyed the dispatch of the royal family of Shang, while some Bangbo were in a hostile state with the Shang dynasty. The power of Bangbo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mainly came from its identity within the clan and state, and its dependence on the Shang king was weak. In this period, Bangbo was detached from the vassal system of the dynasty and was the main variable in the vassal system of Shang. After the reform betwee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vassal system of Shang remained relatively intact,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vassal system of Western Zhou. Compared with Bangbo in the Shang dynasty, the attribution of Bangbo to the royal family wa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division, Bangbo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Eastern Bangbo and the Western Bangbo.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ategories of Bangbo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political, cultural, military and other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heir status and role in the vassal system of the dynasty. As an ally of the Zhou people, the Western Bangbo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force for the royal family to rely on, while most of the Eastern Bangbo should belong to the vassal 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wa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vassal states in the same region respectively, and had a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vassal states in the same region.

Keywords: Western Zhou; Vassals; Bangbo; Marquis; The Five Rank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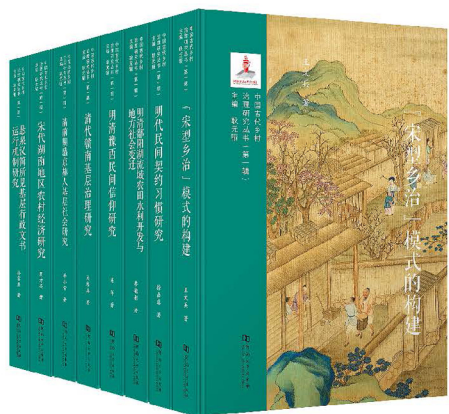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徐莹】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研究丛书（第一辑）”

耿元骕 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研究丛书（第一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丛书第一辑共八卷，分别为《“宋型乡治”模式的构建》《明代民间契约习惯研究》《明清鄱阳湖流域农田水利开发与地方社会变迁》《明清豫西民间信仰研究》《清代赣南基层治理研究》《清前期盛京旗人基层社会研究》《宋代湖南地区农村经济研究》《悬泉汉简所见基层行政文书运行机制研究》。丛书以扎实的个案、多元的史料与清晰的问题意识，深入阐释了古代乡村的组织逻辑、秩序原理，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智慧、思考当代乡村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参照。

料与清晰的问题意识，深入阐释了古代乡村的组织逻辑、秩序原理，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智慧、思考当代乡村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参照。

“抗战大后方工业史资料丛刊（第二辑）”

张守广 主编

“抗战大后方工业史资料丛刊（第二辑）”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共有五卷，分别为《工厂内迁文献》《工业金融文献》《工业调查文献》《手工业文献》《民生公司工矿企业文献》。丛书突破传统档案局限，广泛收录历史档案馆资料、民国期刊报纸、非档案调查资料及工矿企业原始文献，各卷由领域内权威学者牵头编纂，分工明确且特色鲜明，不仅系统展现了战时中国工业化进程，更以扎实的资料基础与权威的学术编纂，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是抗战史与工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